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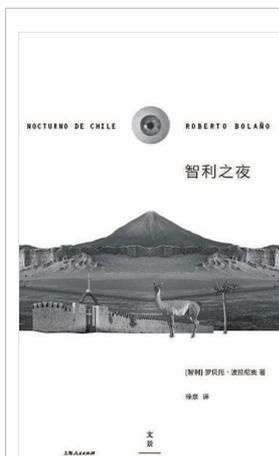
用一生时间去守护“纯粹无瑕”的文学

——读波拉尼奥《智利之夜》

■谷立立

在《波拉尼奥小说的几何学》一文中,哈维尔·莫雷诺将罗贝托·波拉尼奥的小说描述为一个不完整的直角三角形。先不说莫雷诺的阐释是否合理,毕竟他把以《未知大学》为代表的诗集排除在外,只选取了《智利之夜》《荒野侦探》《2666》等十来部小说。这些小说来自波拉尼奥的最后十年,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主题:在生命的尽头戮力回望过去,描绘拉美的文人生态。当然,这样的文学并不温柔,它与波拉尼奥一起,在漫漫的流浪路上,相伴而行,经受洗礼,练就出凌厉的本性。没有品尝过磨难的人,应该无法理解他的坚持。他深信文字的“纯粹无瑕”,情愿用一生的时间,去守护那些被他视若珍宝的文学作品。

可惜,命运并没有给波拉尼奥太多时间。为了再现他的拉美情结,为了赶在结束之前说完心中所想,他的语气是急迫的,态度是激烈的。《智利之夜》是一本将死之人的临终自白。叙述者塞巴斯蒂安·乌鲁蒂亚·拉克鲁瓦,兼具三种不同身份:神父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。然而,立志文学创作并不代表真正明白文学的意义。至少,拉克鲁瓦并不纯粹,从一开始,他就放弃了作家的天真,开启了他的“黑夜”之旅。那么,这里究竟存在怎样的文学?波拉尼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,不过结合他的另一部作品《遥远的星辰》,不难看出端倪:上世纪



《智利之夜》
〔智利〕罗贝托·波拉尼奥著
徐泉译
世纪文景公司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智利作家
罗贝托·波拉
尼奥



60年代,某位自称为“野蛮文学运动”开山鼻祖的文学恶棍,将自己关在遍地垃圾的房间里,通过亵渎经典作品,与成名作家进行灵与肉、精神与凡胎的沟通,进而超越文学壁垒,将自己定义为“伟大作家”。

或许,这只是波拉尼奥的想象,但不可否认的是,它的确真实存在过,“至少是因为我们为了避免跌入垃圾堆里,我们才称其为文学”。不知道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,波拉尼奥有着怎样的心情。可以肯定的是,他无愧于他写下的每一个字、每一段话。终其一生,他不会像留守在智利的同行那样,为了无限度地向上爬升,污损了文学纯净、柔软的质地。《智利之夜》的六个故事,从不同侧面印证出波拉尼奥的观点,串联起恶

棍拉克鲁瓦的一生。最初,他在文学评论家费尔韦尔的庄园里,仰望诗人聂鲁达的背影;随后,他听到危地马拉画家和奥匈帝国鞋匠的故事,终于明白坚持理想的代价;接着,他去往欧洲,以“古迹保护”的名义,学习、参与用猎鹰捕杀鸽子的行动;回国后,他闭门不出,读起了古希腊文学,对窗外的变故装作不知;最后,他受邀到小说家玛利亚·卡纳莱斯的沙龙彻夜狂欢,却不清楚宅子的地下室,正在进行着怎样肮脏的勾当。

那么,波拉尼奥呢?他的身体“业已衰老”,精神却永远年轻。他就是故事里那个患有严重厌食症的中美洲画家,“反复又徒劳”地想要在巴黎的街市,寻找墨西哥城黎明前一小时的天空;他是得不到国王资助的奥匈

帝国鞋匠,执意以一己之力为天下英雄树碑立传。这意味着,就算明知世界已经千疮百孔,他仍然会和挑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一起,“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己执著的梦想中去,越过噩梦前进”。因为,在梦的另一边,有他日夜期盼的墨西哥城,以及“威严、宁静、暗沉而又庄严”的英雄岭。哪怕要把身体彻底掏空,哪怕注定是“溃败”的前奏,也要让自己成为“英雄岭”里唯一的英雄。

回顾前半生,波拉尼奥曾经这样写道:“我失去了一个祖国,却赢得一个梦。”当然,这个他从博尔赫斯那里拿来的意象并不美好,更不诗意。至少,波拉尼奥从来没想到,要用甜蜜的糖霜去包裹现实的苦药,去掩饰恶棍的劣迹。仿佛要制作一部无声电影,《智利之夜》在黑夜起身,

在黑夜中终结。但谁都不要指望,波拉尼奥会给我们提供一段完整、鲜活的影像。如他所说,《智利之夜》就是一种混合着梦魇、谵妄、谎言的呓语,是一卷闪耀在白色屏幕上的“烧毁了”的电影胶片”。要命的是,胶片映照不出梦中人真正的模样,却带来了似是而非的幻觉: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身在梦中,反而自然地“接受”了这一切,宣称“我们的动作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像羚羊那样活动着,或者像梦见了羚羊的老虎那样活动着”。

问题是,羚羊是怎么活动的?老虎又是怎么活动的?如果不能紧紧地“跟随着历史”,柔弱的羚羊难免会成为猛兽嘴边的腐肉。于是,为了在虎爪下偷生,羚羊学会了改变。久而久之,就有了这样一幅荒诞的画面:羚羊扮作老虎的模样,亦步亦趋地跟随猛兽,走入漫漫的夜色之中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成长?或许,可以用《未知大学》里的句子来诠释拉克鲁瓦的成长:“而噩梦对我说:你将成长。你将把痛苦和迷宫的形象抛下,你将遗忘。但那时候成长可能是一桩罪行。”显然,早在他的诗人时代,波拉尼奥就有了最初的文学方向。在这里,写作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“头脑风暴”,只要生命还在,就不会停下脚步。而《智利之夜》呢,作为波拉尼奥飓风的核心,不过是依照他事先埋好的伏笔,一步一步地卷了过去。

“奥斯维辛的摄影师”,指的是波兰摄影师威廉·布拉塞,他于1940年8月31日遭纳粹逮捕,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。布拉塞并不是犹太人,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,本来也有机会加入德国籍,但他却拒绝了。凭借着摄影师的手艺,布拉塞被安置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份识别部门充当摄影师,他的主要任务是拍摄囚犯的档案照片和自杀囚犯的记录照,拍摄记录以囚犯做试验的臭名昭著的“医学研究工作”,同时还要为纳粹军官拍摄各种人像照片。1945年,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,布拉塞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保留下数千张底片,成为控诉纳粹残暴罪行的最直接的见证。整整70年之后,德国教育学专家莱纳·恩格尔曼写下了布拉塞的生活纪实,目的是“通过布拉塞的个人命运,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,以及所有无辜受害者在纳粹时代遭受的不幸和祸害”。

当布拉塞第一天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,并成为囚犯3444号时,他首先听到了这样的“欢迎词”：“在这里,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,一个牧师能活三周,一个普通犯人允许活三个月。唯一离开集中营的可能就只有烟筒!”尽管

布拉塞不敢相信,这种完全灭绝人性的邪恶行为乃是人类所为;尽管有无数的问题堵塞在他的心头,让他恐惧迷茫,不知所措,但面对严酷的现实,他不能不首先考虑如何活着。应该说布拉塞还算幸运的,因为有一技之长,他成为集中营里的摄影师,没有被任意射杀,没有被送进毒气室,没有在强制劳动时被党卫队用铁锹柄打死……在集中营期间,布拉塞拍下了大量囚犯的照片,其中有男人,也有女人;有老人,也有孩子,他们最终或者饿死,或者冻死,或者被枪毙,或者被毒死,大多数都没能活着走出集中营。他们只是在布拉塞的镜头里留下了一张张无名的面孔,这些无名的面孔将冰冷的数据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个体——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生活,却在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失去尊严,失去生命。

在奥斯维辛集中营,所有的

为捍卫人性而战

——读《奥斯维辛的摄影师》

■王森



《奥斯维辛的摄影师》
〔德〕莱纳·恩格尔曼著
〔德〕祁沁雯译
新星出版社出版

囚犯都要到布拉塞这里来拍照,每天超过百人,一周七天从不间断。取景器缩短了布拉塞和这些囚犯的距离,身为囚犯中的一员,他既能够真切地看到他们惊慌的

眼神和恐惧的面孔,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绝望与无奈的心情。在布拉塞的镜头里,有几乎瘦成骨架的自杀者,有被注射死亡的人,还有一名即将踏入毒气室的妇女,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,嘴巴因大喊而张开着……其中有一组照片曾经被广泛关注,照片上是一个可爱的女孩,她只有14岁,被狱警打伤了脸颊。前两张照片中的她显得惊惧而憔悴,在第三张照片中,布拉塞准确捕捉到她的青春和美丽,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——拍下这组照片后不久,这个女孩即惨死在集中营里。布拉塞还拍下许多党卫队军官的人像照,从照片上看,这些杀人狂魔和常人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区别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的确都是一些普通人,却集中体现出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特征,意味着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“平庸的恶”。

布拉塞的职业保障了他能够在集中营生存下来,并成为“在不可想象的邪恶之地为捍卫人性而战的人”。但正像徐贵教授所说的那样,布拉塞不是英雄,他的故事只是一个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的故事,可以想象,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偶然,他同样会成为一个无名的受害者,留下的只是一个冰冷的数据而已。即便是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,布拉塞也时常萌发出常人所有的情感,他带着深厚的感情拍摄那些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囚犯,为他们留下最后的尊严。他甚至爱上了一位女护士,见面时聊上几句,也算是他们集中营生活中极其宝贵的调剂。事实上,正是常人的情感激发出布拉塞人性中的善,让他有勇气面对纳粹的暴行,并在关键时刻将纳粹暴行的证据保留下来。

战争结束后,28岁的布拉塞开始新的生活。他希望重操旧业,却总是在照相机的取景器中看到那些集中营的囚犯,“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,一个个面临死亡的人”。开始是眼睛让他无法工作,后来手也不听使唤,无法按下快门。1946年,布拉塞终于停止了摄影师的工作,从此之后,他再也没有碰过照相机。